

目 录

总序	v
绪论	1
0.1 研究背景	1
0.2 中俄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现状	4
0.2.1 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现状分析	4
0.2.2 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现状分析	10
0.3 全书框架	17
第一章 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历史梳理	19
1.1 俄语的源起与标准语的形成	20
1.1.1 古俄语及双言制时期	20
1.1.2 旧俄语及标准双语时期	24
1.1.3 俄语标准语改革与形成时期	25
1.2 19—20世纪现代俄语标准语的形成与发展	30
1.2.1 现代俄语标准语的形成与初步发展	30
1.2.2 现代俄语标准语的进一步发展及苏联扫盲运动	31
1.2.3 文字改革与现代俄语标准语的深入发展	35
1.3 小结	38
第二章 俄罗斯国家语言治理能力	40
2.1 俄罗斯国家语言管理机构	40

2.2	俄罗斯国家语言政策	44
2.2.1	俄罗斯联邦总统国情咨文（1994—2015年） 国家语言政策相关内容	46
2.2.2	联邦国务委员会与总统委员会国家语言政策 关注要点	49
2.2.3	联邦战略文件中俄罗斯国家语言政策的相关内容	54
2.3	小结	58
第三章 俄罗斯国家语言核心能力		59
3.1	俄罗斯国家通用语发展历程	59
3.1.1	俄语的法制化历史进程	60
3.1.2	俄语纯洁性问题	62
3.2	2002—2020年《“俄语”联邦专项计划》	72
3.3	俄罗斯国家语言智能化建设	79
3.3.1	俄罗斯人工智能发展梳理	80
3.3.2	俄罗斯国家语言资源的开发应用	84
3.4	俄罗斯民族语言能力概况	94
3.4.1	俄罗斯民族语言的教学问题	95
3.4.2	俄罗斯民族语言的保护与发展	106
3.5	小结	115
第四章 俄罗斯国家语言战略能力		118
4.1	俄罗斯国家外语教育能力	118
4.1.1	俄罗斯的军事外语人才培养	119
4.1.2	俄罗斯的非军事外语人才培养	133
4.2	俄罗斯国家语言拓展能力	146
4.2.1	俄罗斯国家语言影响力	146
4.2.2	俄罗斯国家语言传播力	177

4.3 俄罗斯国家语言资源掌控能力	184
4.3.1 俄罗斯联邦人口普查对常住居民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	185
4.3.2 政府资助下的语言资源科研项目	191
4.4 小结	196
结语	198
参考文献	200
法规条约	216

总 序

“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丛书”是2018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简称“国家语委”）重大科研项目“‘国家语言能力’内涵及提升方略研究”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该项目是国家语委首批立项的重大科研项目，立项的背景是，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世界舞台中央，但我国的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能力不相匹配。国家语言能力是“政府运用语言处理一切与国家利益相关事务的能力”。它是国家软实力的标志，也是硬实力的支撑。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时，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军事实力发挥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国家军事实力展现的是使用“硬武器”的成效，国家语言能力展现的是使用“软武器”的成效。国家层面的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活动都需要强大的国家语言能力作为保障。

2016年“国家语言能力”首次写入教育部与国家语委制定的《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该规划中明确写道：“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提升语言文字信息化水平，全面提升语言文字事业服务国家需求的能力，实现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国力相适应。”从本质上说，国家语言能力的强盛取决于国家综合国力，但国家综合国力的强大不会自动地促成国家语言能力的提升。换句话说，强国可助强语，强语可助强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强国定能强语。在目前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形势下，迫切需要我国政府加强领导，社会组织和学者群体高度关注，以形成共识，从战略层面进行规划，并采取相应措施，使我国国家语言能力与综合国力相匹配，让国家语言

能力助推综合国力，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这就是本课题的重大战略意义。

本课题组自获批“‘国家语言能力’内涵及提升方略研究”这一重大科研项目以来，深知责任重大、意义深远。本人在前期研究基础之上，提出了国家语言能力“三角理论”，即国家语言能力由三部分组成：（1）国家语言治理能力；（2）国家语言核心能力；（3）国家语言战略能力。这三个分项能力又各涵盖3—4个维度：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包括治理机构体系构建、规划制定与实施、语言生活研究与交流；国家语言核心能力涉及国家通用语普及、国家通用语规范使用、国家语言智能化与国家语言和谐生活建设；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则包括国家外语教育、国家通用语国际拓展、国家语言人才资源掌控和国家对外话语表述。可以看出，三个分项能力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三角形。国家语言治理能力位于顶端，指政府处理国内外两类语言事务的效力和效率，具有全局性和统领性特点，决定着核心和战略两类能力的发展方向和效果。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特点，是国家政治安全、领土完整、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信息安全等的压舱石，是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发展的前提，应置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优先位置。国家语言战略能力着眼未来，具有前瞻性和长远性特点，是国家对外开放、维护国家主权、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国际地位的支柱，对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建设有促进作用。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和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又反作用于国家语言治理能力的建设和发展。

在此基础上，本人和张天伟教授、杨佳博士后、董希骁教授、詹霞副教授、戴冬梅教授、李迎迎教授、邵颖副教授、张佳琛博士、董丹博士、汪波副教授等人共同努力，以国家语言能力新理论框架为依据，融合中外视角，对中国、罗马尼亚、德国、法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荷兰、意大利、韩国等国家的语言能力开展了个案式的深入调查分析。《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是团队取得的首批研究成果。《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全面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来中国政府在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和国家语言战略能力三个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彰显了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的优势，同时也审视其不足之处，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性意见。《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梳理了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历史，并对其发展特点进行了总结和归纳，为探究中国和罗马尼亚两国在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目标、路径和模式上存在的差异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材料。除了《新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罗马尼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外，“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丛书”第二批著作《德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法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马来西亚国家语言能力研究》《荷兰国家语言能力研究》《意大利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韩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也将陆续与读者见面。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我们希望能够为学界提供双向互动比较的内外视角，探究中国和其他国家语言能力发展体系的异同，由此借鉴外国经验，提出提升我国国家语言能力的策略，最终将我国建设成世界语言文字强国。丛书旨在抛砖引玉，期待各位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文秋芳

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 / 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

2021年5月1日，劳动节



绪论¹

2011年起，文秋芳等学者对美国学者理查德·莱希特（Richard Brecht）和罗纳德·沃尔顿（Ronald Walton）于1993年提出的“国家语言能力”（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进行了先导性研究，由此引发了学界和政府的广泛重视，相关研究在各界关注下得到持续发展和完善。本书基于文秋芳（2019a）提出的国家语言能力三角理论，着眼于理论提出的三个分项能力——“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对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进行阐释，以期成为国内外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研究领域较为全面、新颖的研究成果之一。本章将简要介绍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的产生背景、中俄相关领域研究现状和全书框架。

0.1 研究背景

新时代背景下，中俄两国坚持守望相助、深度融通、开拓创新、普惠共赢的发展模式，为共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表率。中俄两国元首于2021年共同决定将《中俄睦邻友好合

1 本书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重大标志性项目“国家语言能力国际比较及理论创新”（2022SYLA001）的研究成果。

作条约》延期五年，这为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大舞台，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携手应对全球性战略挑战注入正能量，也是中俄两国关系行稳致远的持续显现。在中俄两国关系持续向好、稳固发展的主旋律之外，同时存在一些唱衰中俄关系的“杂音”，“‘离间中俄’已经成为一种为政治服务的舆论战手段”（许华 2021：41）。在世界格局愈加多变、国际形势渐趋紧张的大环境下，如何系牢人文交流纽带，更好增进民心相通、促进文明互鉴，是新时代各界学者的重要使命。

语言在国家对内维护多民族团结、增强国家认同，对外提升国际话语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两方面均起到关键作用，语言能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家语言能力是国家处理国内外战略事务的语言能力，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和文化强国的基础（文秋芳、张天伟 2018）。提升国家语言能力，一方面要及时对本国国家语言能力进行梳理总结，另一方面应秉持“非尽百家之美，不能成一人之奇”的精神，虚心借鉴他国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的经验。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国家语言能力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 193 个国家“国家语言能力指数”排名结果¹，俄罗斯继美国、中国、英国、德国之后位列第五，俄语成为全球语言影响力较强、使用范围广的关键语言之一。俄罗斯十分注重语言能力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苏联解体以后，语言文字始终是俄罗斯维护境内民族团结，主张后苏联空间地位，以及向世界推广俄罗斯语言文化的重要议题。俄罗斯政府投入大量精力推动俄语普及、规划语言传播、发展外语教育、培养语言人才、保护少数民族语言，这对提升我国国家语言能力、推进国家语言能力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本书尝试以文秋芳（2019a）提出的国家语言能力三角理论为指导，通过国家语言能力评价指标，以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形式对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构建的相关案例展开分析，在宏观层面上探讨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的建设模式，总结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过程中的特色路径和优势，为

1 数据来源：<https://argg.bfsu.edu.cn/info/1138/1457.htm>（2021年10月26日读取）。

提升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提出相应建议。如图 0.1 所示，国家语言能力由“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国家语言战略能力”三部分组成，三个部分相互作用，形成相对稳定的国家语言能力“铁三角”模式，每个分项能力又涵盖三到四个维度。文秋芳（2019a）对图 0.1 作了更为详尽的解释：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具有全局性特点，决定其他两类能力的发展；国家语言核心能力位于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优先位置，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特点；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具有前瞻性和长远性特点，在语言治理能力的引导下助推语言核心能力建设，与语言核心能力一道反作用于语言治理能力建设。本书将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分为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和国家语言战略能力三部分，对各部分展开详细介绍。研究发现，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各部分构成要素及其成分与我国不尽相同，多民族语言特色为俄罗斯语言发展带来更多“变数”，成为俄罗斯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国家语言和谐生活的机遇和挑战（详细内容见本书第三章，此处不再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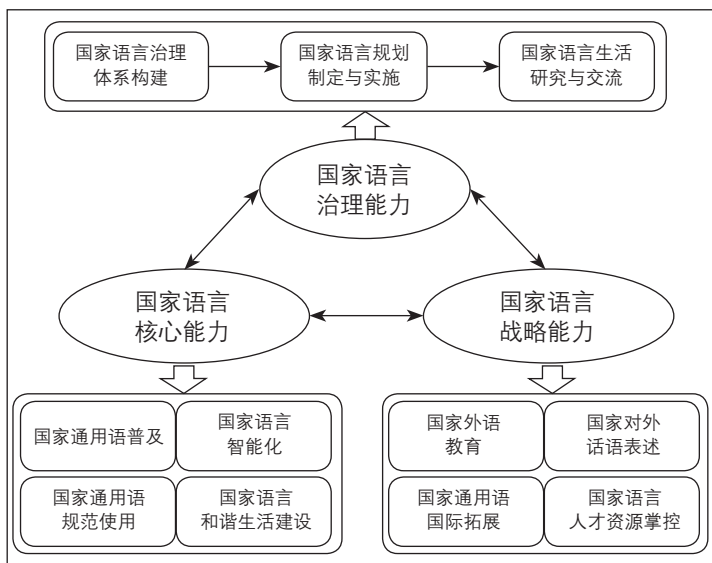


图 0.1 国家语言能力构成新框架（文秋芳 2019a）

0.2 中俄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现状

0.2.1 中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现状分析

我国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经历了十余年的飞速发展，国家语言能力三角理论框架（文秋芳 2019a）日臻完善，可以说处于世界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领跑地位。我们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来源平台，选择“关键词”并输入“国家语言能力”进行数据检索，共得到 77 篇相关文献；选择“篇名”并输入“国家语言能力”进行检索，共得到 55 篇相关文献。所得文献中，25 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42 篇发表在国内各类核心期刊，可见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关注与重视。从发文情况来看，目前国内形成了以北京外国语大学、江苏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为主要研究基地，以文秋芳、李宇明、赵世举、戴曼纯、张天伟、沈骑、董希骁等学者为核心研究群体，以语言政策与战略、外语教育、语言规划与管理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研究态势。

0.2.1.1 语言政策与语言战略研究

宏观概括方面，文秋芳、杨佳（2021）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语言文字工作分为四个阶段，对各阶段的工作重点和特色内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归纳出中国共产党语言文字工作始终践行人民观的三点体现，同时对新时代语言文字工作如何更好践行人民观提出了四点建议。鉴于现有研究成果少有微观量化分析，张天伟（2021a）采取多指标综合评价分析方法，对国家语言能力指数体系五个一级指标进行升级完善，提出了新国家语言能力指数体系（包含 5 个一级指标、12 个二级指标、26 个三级指标），对数据来源和指数构建作了详细介绍，并根据新国家语言能力指数体系对 193 个国家的国家语言能力进行了量化排名和数据分析，着重对中国国家语言能力进行了判定。赵世举（2020）对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语言文字事业的发展特点、发展成就进行了梳理，总结了我国新时代背景下语言文字事业的五大发展形势，同时提出我国语言文字事业的六项新任务。文秋芳

(2019a)总结了国内学者关于国家语言能力的主要观点及评述,由此归纳出现有国家语言能力理论的局限性,提出国家语言能力的新定义,界定其构成,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各阶段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挑战作出总结,提出相应的建议。此外,基于国家语言能力的新定义,文秋芳(2019b)还聚焦涉内事务的语言治理,从三个方面对我国语言文字治理能力的发展特点、成就和挑战进行梳理总结,对相关工作提出四点发展建议。杨佳(2019)以国家语言能力新理论框架为指导,总结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国家通用语普及情况,从政策力、实践力和绩效力三方面入手,对普通话推广取得的成就、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归纳总结,建议未来推广普通话应遵循差异性、市场性和融合性原则。赵世举(2015)就国家语言能力的组成内容和定义提出建议,从国家语言资源占有量、国家语言使用及服务能力、语言资源开发利用能力、国民语言能力、语言人才储备能力、语言管理及语言事业发展能力、语言影响力等方面论证全面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微观探索方面,张天伟(2020)从研制应急语言形式、保障语言弱势群体权利两方面入手,对日本、美国、爱尔兰等六个国家的应急语言实践应用进行了简要介绍,从五个方面概括了国外应急语言研究的路径和研究内容,同时对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方法、研究特点作出总结,提出我国在应急语言研究起步阶段的六大发展方向。戴曼纯(2016)总结了我国外语语言能力存在的四个问题,围绕我国外语语言能力的提升对外语人才需求问题展开抽样调查,对调查范围、调查对象、问卷设计形式、调查内容以及数据收集统计方法进行介绍,针对调查结果对语言政策制定部门和高校提出相应建议。魏晖(2016)对语言资源的内涵、构成、特性、配置与管理进行了梳理总结,从语言资源观出发,提出国家语言实力的内涵和构成因素并作出评价,建议将语言吸引力、语言传播力作为一级指标,一级指标下分设两个和四个二级指标,并由此对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语言实力间的异同进行分析,厘清文化强国的基本特征及其与国家语言能力、国家语言实力的关系;此外,还以企业战略管理资源学派理论为指导,对国家语

言资源类别、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国家语言能力的构成进行梳理和评价，并由此提出提升国家语言能力的四点建议（魏晖 2015）。张强、杨亦鸣（2013）详细介绍了当前国际学术界对“语言能力”的三种认识，提出语言能力的三层面构想，建议从深入了解语言能力内涵、研究不同层次的语言能力特点、提升语言能力实践、重视母语语言能力研究与提升四个方面入手，完成语言残障人群语言能力康复与社会共融等五项重点研究任务。

0.2.1.2 外语教育研究

张天伟（2021b）梳理了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主要发展阶段、特点和成就，指出外语教育政策制定目前存在的五个主要问题并提出四点建议。郑月莉、马月秋（2021）对国家外语能力内涵及组成要素进行归纳，提出提升国家外语能力的四条策略。董希骁（2020）对中国非通用语产业结构、产业成熟度进行介绍，指出其发展特点，总结了我国非通用语产业面临的主要问题。郑咏滢（2020）提出中国外语教育面临的几大挑战，介绍了复旦大学的外语人才培养模式与特点，并据此提出具体应对措施。杨旭、杨凌汀（2020）基于国家语言能力视角指出了中国英语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并相应提出三点建议。

除对中国外语教育展开研究外，部分学者还展开了相关领域的国别研究。非通用语研究方面，董希骁（2021）基于文秋芳提出的国家语言能力框架，对罗马尼亚通用语言的国际拓展情况进行介绍，提出罗马尼亚对外推广国家通用语言的两大显著特点。汪波（2020）通过介绍韩国的经验，探索了推动我国非通用语教育向前发展的三大途径。叶良英（2020）在国家语言能力框架下概括了科威特中小学外语教育的特点，将其与我国中小学外语教育发展模式进行对比并作出评价。在通用语研究方面，学界主要开展了英国、俄罗斯、法国的国别研究。高黎等（2021）撰文介绍了英国 2000 年以来的语言政策，对英国 2011—2019 年的语言教育进行了数据分析，概括其语言政策的优势和不足，指出科学规划国家语言能力的重

要性及评估语言教育政策的必要性，进而提出相应的外语教学建议。濮实（2020）强调了国家外语能力对发展国家语言能力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借鉴英国中小学外语课程改革有益经验拟定中国国家外语教育规划。李艳红（2016）从美国开展的关键语言教育出发，对美国关键语言战略实施体系进行详细介绍，进而提出我国在“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进行外语教育规划的紧迫性。谢倩（2015）总结了英国国家语言教育现存的不足，指出加强外语教育对完善英国语言政策规划的意义及对中国语言战略研究的启示。李迎迎（2013，2014a，2014b，2016）对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开展了深入研究，对俄罗斯高校外语人才培养、俄罗斯军队语言能力建构体系进行了详细阐释，对21世纪以来俄罗斯语言政策进行详细梳理，从国家认同与语言民族主义两方面对相关语言政策形成成因进行深入思考，指明了提升国家语言能力在增强国家软实力和硬实力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对中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提出合理建议。戴冬梅（2010，2014）较早开始对法国国家语言能力进行研究，她从法国外语教育政策、外语教学及实践等方面介绍了法国对各年龄阶段学生的差异化外语教学模式；戴冬梅、谈佳（2013）从提升军人外语水平、储备高级军事外语人才两方面对法国陆军外语能力特点进行了评析。

0.2.1.3 语言规划与语言管理研究

语言规划与语言管理研究在近三年取得长足发展，研究规模持续扩大、问题切入点不断创新、研究层次也不断提升，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宏观层面，李宇明（2021a）对中国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第三个黄金期前20年的四大工作理念、五大工作形势、八项工作内容及其成就进行了全面概括；梳理了“语言能力”的相关概念，以“个体”和“群体”为属性对语言能力进行区分，围绕个人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展开研究，依照“语言行为理论”对个人语言能力和国家语言能力进行定义，提倡发展个人的“三语层”语种能力和“三语体”能力，重视国家20/200种关键语言的学习、发展六大语言领域语言能力（李宇明2021b）。苏金智（2021）

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对国家话语能力进行了重新定义，厘清了其内涵和外延，指出生成能力、传播能力和管理能力是国家话语能力的核心要素，总结了当前中国国家话语能力的四大特点和五个问题，最终提出了提升中国国家话语能力的五大主要途径。沈骑（2021）基于语言规划理论框架，按照时间顺序和主体内容将语言规划向话语规划的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50—80年代主要关注语言本体问题，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主要关注语言使用、传播与接受问题，21世纪以来主要关注翻译规划和语言技术规划问题，并将国家话语规划的基本内容梳理为六个部分——话语本体规划、话语地位规划、话语教育规划、话语声誉规划、话语翻译规划和话语技术规划，据此从三个维度出发勾勒了新时代国家话语能力建设的三大目标。沈骑、赵丹（2020）提出现有国家语言能力理论建构的两大问题，结合语言规划与全球治理相互关系探讨国家语言能力规划范式转变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提出全球治理变革新格局下国家语言能力规划面临的四项主要任务。周庆生（2019）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内地发表的中国语言政策相关中文文献，对语言政策、文字改革、语言规范、语言立法、语言保护、语言服务与语言能力提升、语言战略、语言政策流变等八个方面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强调中国语言政策目标必须服务国家政治目标的发展任务。

微观层面，沈骑、康铭浩（2020）梳理回顾了语言治理的概念与问题，介绍了国内外语言治理的研究现状和实践经验，从治理过程、治理行为主体、治理内容三个方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语言治理能力规划提出初步框架。关彦庆（2020）从网络基本信息、网络安全问题两个方面对中国网络现状进行描述，概括了网络言语行为的类型及特征，从年龄、职业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出发介绍了网民特征，提出管理好网络言语行为是完善国家语言能力的要素之一，对国家语言文明建设具有战略意义。沈骑、夏天（2018）梳理了语言战略规划的概念内涵，对语言战略定义进行了补充，确定了“一带一路”语言战略在语言地位、语言本体、语言教育、语言声誉、语言服务、丝路话语六大基本方面的战略规划问题并



提出相应建议。张天伟（2017）提出中国非通用语教育主要面临三大问题——缺乏语种设置上的规划、缺少对人才资源的掌控以及高端人才的培养；他借鉴美国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经验，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制定语言战略规划、建立语言人才资源数据库、改革非通用语教育教学模式三点建议。戴曼纯（2011）认为提升国家外语能力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需求，提出中国国家外语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通过介绍欧美国家应对国家语言能力缺失的经验，梳理了语言规划在政治、军事、社会等领域的安全价值，对外语教育教学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四点建议。

除上述三大研究领域外，部分学者还针对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的语言能力开展了相关研究。例如，丁赛、阎竣（2021）围绕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居民普通话口语交际能力对该地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带来的影响展开研究，指出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与其普通话水平呈正相关，农村劳动力的年龄与其熟练使用普通话的水平呈负相关；而农村劳动力的普通话水平对其非农就业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在少数民族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正向促进作用越明显。李志忠、任晔（2021）通过语言调查数据对影响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普及率的各种因素进行研究，提出人口流动程度与普及率呈正相关关系。罗兰兰等（2021）考察了壮族村落学前儿童的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水平，指出城乡差异及其发展特点，提出应尽早进行有效的语言干预，加大对贫困地区村落儿童国家通用语言能力发展的支持和监测力度等建议。刘韵华、华锦木（2020）聚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少数民族教师及其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探索提升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的途径。李婕、杜秀丽（2020）以新疆 500 名少数民族乡民为调研对象，考察少数民族在国家通用语学习中的问题，利用 SPSS 22.0 软件对调研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刘海红、薛军利（2020）以西藏自治区幼儿园大班藏族幼儿汉语测试结果为依据，分析汉语学习中的现存问题，并提出相应建议。曹秀玲、邓凤民（2019）提出国家语言能力建设应当重视民族语言能力问题，从国家安全角度呼吁加强民族语言资源保护和利用。

0.2.2 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研究现状分析

苏联解体初期，俄罗斯社会发生重大变革，国家综合实力大幅下降，国内民族矛盾多发，国际影响力大幅收缩，对内维稳和对外重振的双重要求使俄罗斯政府充分认识到语言在强国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因此俄罗斯政府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国家语言能力的建设，将其视为国家优先发展战略之一。

俄罗斯学者虽然尚未明确使用美国学者莱希特和沃尔顿提出的“国家语言能力”概念，但对于语言能力研究同样十分重视，在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等研究方向上积累了丰富科研经验，形成了以弗·米·阿尔帕托夫（В. М. Алпатов）、米·亚·马鲁先科（М. А. Марусенко）、亚·列·阿列费耶夫（А. Л. Арефьев）、亚·扎·加里波夫（Я. З. Гарипов）、玛·雅·戈利克（М. Я. Голик）、奥·伊·扎维亚洛娃（О. И. Завьялова）、康·康·科林（К. К. Колин）、玛·叶·科斯秋克（М. Е. Костюк）、阿·纳·卡扎良（А. Н. Казарян）、亚·奥·拉列蒂娜（А. О. Лалетина）、穆·马·齐亚吉科夫（М. М. Зязиков）等学者为首的语言能力研究团队。例如，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阿尔帕托夫于2000年出版专著《150种语言与政策（1917—2000）：苏联与后苏联空间社会语言学问题研究》（«150 языков и политика. 1917-2000. Социол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СССР 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该书主要分三个阶段梳理了苏联及后苏联空间国家的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分析了多语言社会中影响语言使用的主要因素、苏联语言政策的一般规律与自身特色，以及俄语在后苏联空间受“排挤”的趋势。俄罗斯科学政治书籍出版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ч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нига）于2015年出版发行了俄罗斯第一本研究俄罗斯联邦、后苏联空间及欧盟国家语言与民族认同关系的著作——《语言与民族认同：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的现代挑战》（«Языки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вызовы национальному единству и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й целостности»），该书由俄罗斯学者马鲁先科撰写，着

重指出民族语言冲突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威胁所在，对俄罗斯移民进程中出现的各类冲突及潜在危险进行了深入研究。阿列费耶夫于2018年出版《语言社会学：教育体系中的民族语言和外语》（《Социология язык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 иностранные языки в систем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一书，对俄罗斯教育领域的语言政策、俄罗斯基础教育至高等教育的民族语言和外语学习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同年，阿列费耶夫以发展俄罗斯国家通用语为专题，撰写《语言社会学·俄语：现状及世界传播趋势》（《Социология язык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стояние и тенденции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в мире》）一书，考察了俄语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情况，对国际俄罗斯语言文学教师协会（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ассоциация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 литературы）为普及俄语开展的各类活动、国外俄罗斯学者培养等问题进行介绍和评析。对俄罗斯学界有关语言能力研究的发文进行梳理后，本书总结出学者们普遍关心的三个研究主题，下文将分别详述。

0.2.2.1 语言政策的宏观研究

俄罗斯语言政策的宏观研究整体分为俄语语言政策研究与民族语言政策研究两部分，具体包括语言政策制定的背景介绍、内容梳理、目标及任务、发挥的作用及面临的问题等。国家语言政策方面，Дятленко（2007）提出制定语言政策时须综合考虑六方面因素，尤其应注重社会学科相关因素，以便语言政策能够更好地完成国家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历史任务。Костюк（2009）考察了语言政策与俄罗斯社会安全二者间的关系，指出语言政策对公民意识起到保护作用，能够帮助公民在受到信息和文化冲击时建立正向机制，而其他组织机构难以具备同样的保护功能。Пахилова & Скиба（2013）认为，语言政策是各国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服务于公民民族认同，有助于展现民族价值、在世界舞台上树立国家正面形象，因此制定语言政策时必须考虑网络俄语使用规范性问题，以便营造良好的语言环境。Петрулевич & Месропян（2015）对俄罗斯联邦语言政

策进行梳理,提出当下俄罗斯语言政策的主要任务、具体措施和未来发展方向。Шепелев(2015)指出,语言政策在当前俄罗斯国家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俄罗斯政府未能重视语言政策立法等相关现实问题。Белов *et al.*(2017)分析了国家语言政策的相关法律问题,指出现行国家语言相关法律规定的缺陷,对完善国家语言政策法律条文提出建议。Юдина & Кузнецова(2017)探究了语言政策与国家意识形态间的关系,分析了21世纪初语言对俄罗斯经济的影响。Кадочников(2019)对俄罗斯语言政策的目的、目标、任务、需求、可行性进行分析,主要考察了现有法律条文及项目中的语言政策活动能否满足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并保障公民福利等。

民族语言政策方面,Дьячков(1993)以1991年发布的《俄罗斯联邦民族语言法》¹及1992年发布的《俄罗斯联邦民族语言保护和发展国家构想草案》两个文件为研究基础,对两部文件的出台背景及主要内容进行了解读,分析了苏联时期的语言政策特点,指出民族语言的地位在法律文件和实际生活中存在较大差异,同时文件中还存在国家语言相关概念定义模糊等问题。Доровских(2008)梳理了民族语言政策相关法律法规,总结了法律制定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各类因素,并强调了完善民族语言政策法律法规的必要性。Гарипов(2012)对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民族语言政策与人口、种族、民族精神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提出提升民族群体的语言自我意识对保护民族语言具有重要作用。Казарян(2013)探讨了国家语言政策与民族认同问题,总结了俄罗斯民族语言政策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和矛盾。Марусенко(2018)讨论了俄罗斯从民族文化语言政策(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ая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范式到国家功能语言政策(национально-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ая языковая политика)范式转变的必然性,认为列宁及斯大林执政时期形成的民族文化语言政策范式并没有解决特定时期的国家建设问题,反而加剧了民族紧张关系,因此他提出向国家功能

1 本书附有附录“法规条约”,故正文中引述法规条约的内容时不再标注其参引信息。

语言政策范式过渡的主张。

0.2.2.2 语言能力的国别研究

语言能力的国别研究中，俄罗斯学界对于美国研究较多，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其语言发展现状、发展特点、经验借鉴等。例如，Маринина（2012）选取美国及英国的语言政策为研究对象，提出两国国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基于政治正确性原则（принцип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рректности）发展包容性语言（инклюзивный язык），尤其注重性别、年龄、国籍、种族等非语言因素对语言政策制定的影响。Лалетина（2013）对比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及俄罗斯的语言政策特点，指出经济是全球化背景下影响两国语言政策制定的最重要因素，巩固语言地位是两国语言政策的最终目的。Селиверстова（2015）对美国及俄罗斯的语言政策及语言语料库规划措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和介绍。Славина *et al.*（2017）对比分析了语言教育相关政策对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及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移民的语言学习产生的影响。

除研究美国国家语言能力外，俄罗斯学者的关注焦点还包括原苏联加盟国及斯拉夫国家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欧洲国家、亚洲国家的语言政策等。Завьялова（2010）以历时的方式介绍了近代中国的语言现状、语言政策和语言管理机构。Арутюнова（2012）对比分析了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在苏联解体前、解体后两个时期的语言政策特点及俄语发展状态，揭示了后苏联空间各国俄语及民族语言的地位及相关影响因素，指出维护语言多样性与增强民族认同间的有机联系。Каплунова（2017）在博士论文中全面介绍和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语言政策和语言（包括普通话、方言、民族语言，以及俄语等外语）使用状况。Картушина（2015）讨论了自19世纪中期芬兰语成为国家通用语以来芬兰的语言状况，介绍了芬兰的语言政策，考察了全球化背景下其他语言在芬兰语言景观形成中起到的作用。

0.2.2.3 国家通用语俄语的研究

俄罗斯学者对于俄罗斯国家通用语的研究主要涉及俄语使用规范问题、俄语教育问题、俄语在境内外的普及推广问题，等等。

俄语使用规范方面，学者 Демьянков（2008）梳理了俄语规范化的发展历程，提出应当通过建立科学的学术标准来解决俄语不规范使用问题。Москалева（2008）对俄语词典中收录的新词汇、新概念、新现象进行分析介绍，探讨了俄语语言使用规范性问题和俄语发展问题。Лалетина（2011）将语言使用规范看作一个动态现象，基于英语及俄语文本对比，分析了语言系统中的不变成分，阐述俄语使用规范在全球化进程中的转变过程。Перфильева & Новоспасская（2012）对当代俄罗斯纸媒与电子媒体中新的语言使用现象进行归纳介绍，认为当代俄语使用规范受到英语国家的语言使用冲击，呼吁根据现实情况重新确立俄语使用规范。Арутюнова（2016）对 20 世纪 60 年代俄语拼写及标点符号规则问题进行了梳理、分析和解读，指出完善俄语使用规范的重要性。Колин（2007，2008）围绕数字时代对语言规范使用带来的不良影响展开研究，指出这种现象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所在，提出通过语言巩固国家安全的四个角度，着重指出如何在欧亚大陆最大限度发挥俄语的作用。Цумарев & Шестакова（2018）以新版《俄语学术详解词典》（«Академический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为研究对象，从拼写法、正字法、语法、文体、词汇语义等方面考察俄语语言规范性问题等。

研究俄语教育的学者中，Саяхова & Давлетбаева（2009）对俄罗斯联邦主体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双语环境下各阶段俄语教学个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强调更新俄语教学法的必要性。Габдулхаков（2010）综合分析了俄罗斯第二代教育标准出台后低龄儿童的语言教育问题，提出选择适合的语言发展策略对后续教育阶段语言发展的重要性。Черняк（2009）总结了俄罗斯师范类高等学校的俄语教学特点，同时指出其课程设置不合理、授课内容脱离实际等现实问题。Сапа（2010）结合具体案例探讨了如何科学确定俄罗斯高中阶段俄语教学成果监测系统 and 监测指标。Соловьева

(2011) 聚焦俄罗斯教育标准框架下俄罗斯车里雅宾斯克州中小学的俄语教学问题, 以此为基础对提升俄语教学的具体路径提出建议。Березина (2011) 基于受访者意见概括分析了俄罗斯鞑靼斯坦共和国的语言教育政策, 提出改进并完善俄语语言教育的相关建议。Мариносян (2012) 认为, 与独联体国家发展教育领域的合作是俄罗斯外交工作的重点之一, 文章概述了俄语高等教育在独联体国家的发展情况, 重点分析了俄语在亚美尼亚的发展情况以及俄罗斯和亚美尼亚两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现状。Шиганова (2013) 介绍了俄罗斯小学阶段俄语教学水平及教学成果测评类型, 基于俄罗斯初等普通教育标准对俄罗斯小学俄语教学测评工作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Дианова (2014) 研究了语际互动(双语)条件下俄语教育现状及其发展问题, 揭示了俄语语言活力、俄语教育发展过程与国家地缘政治载体间的密切关系。Едличко (2018) 对俄罗斯教育领域的语言政策发展进行分析, 以印第安语言学家布拉杰·比哈里·卡奇鲁(Braj Bihari Kachru)提出的世界英语“三个同心圆”(Three Concentric Circles Model)理论为基础, 构建了俄语作为单一文化交际与跨文化交际语言的环形模式。Браславская (2019) 介绍了俄罗斯外语教育各阶段的主要规范性文件, 归纳了各时期俄罗斯外语教学目标, 对俄罗斯外语教育中使用的多元文化方法及其显著特征进行评述。

有关俄语在境内外的推广普及问题, Шорников (2007) 详细梳理了俄语在摩尔多瓦的发展历程和地位语言变化, 指出摩尔多瓦政府对俄语的抵触与国家发展及国内人民的需求相悖。Виноградов (2009) 介绍了俄语在哈萨克斯坦的发展和语言地位, 对俄语教科书的使用和出版情况进行概括。Бадмаев (2011) 指出俄罗斯国家形象及俄语语言地位在蒙古国出现负增长, 分析了蒙古人民对于俄语的需求问题, 提出扩大俄罗斯影响力、普及俄语的具体途径。Каримова (2012) 从塔吉克斯坦国家语言政策出发, 对俄语在塔吉克斯坦的地位、发展现状、教学情况进行描述。Костанди (2013) 分析了俄语在爱沙尼亚语言政策中的地位与使用特点, 总结了不同学者对爱沙尼亚俄语现状的研究情况, 指出了相关领域的未来研究方

向。Балшайтите (2012) 介绍了苏联解体后俄语在立陶宛的地位变化及俄语学习兴趣问题。Борисова & Шадрина (2012) 以俄罗斯联邦主体萨哈(雅库特)共和国为例,指出俄语在促进国家公民身份认同方面发挥的作用。Стариченок (2012) 以历时的形式介绍了白俄罗斯各教育阶段的俄语学习情况,概括了俄语受到重视的社会因素和国家因素。Эмирова (2013) 围绕后苏联空间中俄语与苏联加盟共和国民族语言的发展现状,探究当前地缘政治条件下两者的互助关系,指出俄语在促进苏联加盟共和国民族语言复兴和发展中起到“再生”作用。Боришполец (2014) 总结了中亚地区俄语的历史发展进程和发展现状,认为中亚地区长久以来热衷于学习俄语的原因主要包括俄语教育竞争力强、劳务移民俄语需求量大、提升求职就业优势需要等因素,进而指出语言可能会带来的民族冲突。Романовская (2016) 分析了俄语在俄罗斯的宪法地位,以俄罗斯联邦主体莫尔多瓦共和国为例,指出俄语作为俄罗斯联邦全境国语与联邦主体官方语言间的语言地位问题。Астафьева & Козловцева (2017) 介绍了俄语在国家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包括确保国家安全、形成公民身份认同、辅助跨种族及跨文化对话等。Ветренко & Дубицкий (2017) 介绍了俄罗斯政府在世界范围内推广俄语面临的问题,指出语言是公民形成政治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也是“国家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Шевченко (2019) 以国立普希金俄语学院(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имени А. С. Пушкина) 2015—2018 年国际志愿者项目“世界俄语使者”(«Послы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мире») 活动为例,总结俄罗斯对外政策中推广俄语、发展俄语教育方面的经验等。

虽然在此无法穷尽所有研究成果,但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中俄两国学者对国家语言政策制定方面的研究正处于不断深入的阶段,两国学者对国家语言能力的作用及影响语言政策制定的各类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关注语言政策对社会经济环境、人文教育环境产生的影响,同时针对如何完善现有语言政策提出了相关建议。在有关语言能力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中,中俄两国学者主要关注以美国、英国为首的英语国家的语言发展



现状，对非通用语种的关注相对有限。相较我国而言，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国家语言政策的法律文件研究更为细致，研究对象主要包括《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国家语言法》《俄罗斯联邦民族语言法》《国家民族政策实施纲要》《俄罗斯联邦教育法》《俄罗斯联邦境外同胞国家政策法》，重点提出了俄罗斯现有法律条款中提升语言能力部分的缺失及相关内容的滞后问题。此外，俄罗斯学者更加关注民族语言政策、民族语言项目开发等问题。在外语教育研究方面，俄罗斯学者不仅探讨了前期内容制定和中期具体实施，更关注到了后期教学质量反馈与学生评价方面，使俄罗斯的语言教育形成双向循环互动，而非教师到学生的单向传输，有助于语言教学的科学发展。

0.3 全书框架

本书依据国家语言能力三角理论框架，以俄罗斯国家语言治理能力、核心能力、战略能力为主线阐释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总结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发展历史、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对比分析我国国家语言能力发展并提出建议。

全书共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书研究背景以及同期中俄两国相关研究和趋势。

第二部分即第一章，对 21 世纪前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简要梳理。

第三部分为第二章至第四章。第二章首先围绕俄罗斯国家语言治理能力，对俄罗斯掌控国家语言能力发展走向的顶层设计进行概括分析，具体介绍了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的四大管理机构——领导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及协调机构；其次，从历时角度出发，分三个方面介绍了俄罗斯国家语言政策，包括俄罗斯联邦总统国情咨文、联邦国务委员会及总统委员会会议内容、联邦战略文件；最后，基于上述内容，总结俄罗斯国家语言

治理能力的特色。

第三章主要从俄罗斯国家通用语发展历程及通用语使用规范、俄罗斯民族语言能力发展、国家语言智能化建设等方面，介绍俄罗斯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优先发展能力——国家语言核心能力，同时对俄罗斯 2002—2020 年间的《“俄语”联邦专项计划》进行详细梳理。本章主要从政策法规、社会调查、语言项目及语言活动等方面论证了俄罗斯强有力的国家语言核心能力，介绍了俄罗斯人工智能及其语言智能化的主要成果，总结了俄罗斯发展国家语言核心能力的相关成就，并基于其发展特点对我国国家语言核心能力的工作要点提出建议。

第四章结合实际案例，聚焦俄罗斯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发展问题，从俄罗斯外语教育能力、语言拓展能力、语言资源掌控能力三个维度入手展开具体研究，从共识角度对比我国国家语言战略能力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优势和不足，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国家语言战略能力提供借鉴。

第四部分为全书结语、参考文献及法规条约。结语部分对全书内容进行简要概括，并对相关领域未来发展前景作出展望。